

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

——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

刘再生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乐歌”，在历史岁月中尘封了几十年后重见天日，成为近年来我国近代音乐史料的又一重大发现^①。它的意义，在于首次向人们展示了19世纪末叶中国学生在教会学堂中自己编创爱国歌曲、抒情歌曲和宗教赞颂歌曲的原貌，而且全部为五线谱记写之四部、二部合唱作品。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一史料浮出水面之前，人们或许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学堂乐歌”是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采用日本、欧美曲调填写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歌唱形式的研究结论。然而，历史是喜欢与人类做“捉迷藏”游戏的“隐形体”，它常常以最隐蔽的方式来捉弄人们。每当历史学家含辛茹苦地根据时代提供的材料做出一种公认为是正确结论的时候，它或许会抛出另外一个新材料，使这样的结论成为悖论或者需要重新加以修订，但这样的史料其实意义恰恰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乐歌”这一新史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新的历史结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到山东蓬莱（古称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②是我国近代早期开设音乐课的学堂之一；“文会馆唱歌选抄”中的10首歌曲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乐歌”。

一、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

——山东登州文会馆

1863年7月3日，美国北长老会(Amer-

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s, North)传教士狄考文博士(C.W.Mateer, 1836.1.9—1908.9.4)，受总会函遣，偕新婚夫人狄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和同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的郭显德博士(H.Corett)夫妇，搭乘自纽约启航的机帆船来中国，时值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为避开南方军队的军舰，他们循东北沿岸航行，直驶北非海岸，南下好望角，再东驶澳洲北上，在菲律宾岛遇台风，几乎沉没，经过165天的艰苦航行到达上海。又自上海搭乘“汕头号”轮船前去烟台，经过三天三夜，

① 见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自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大学有：美国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90年设立大学部，1906年正式成立大学)；沪江大学(1908年创办浸礼大学，1915年改名沪江大学)；武昌的文华大学(1903年设立高等科，1909年为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1901年由苏州博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合并，1905年招大学生)；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年筹建)；广州的岭南大学(1888年在广州设格致书院，1900年迁澳门，改名岭南学堂，1904年迁回广州，1918年改称岭南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1888年创办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改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3年筹办)；杭州的之江大学(1910)；福建的协和大学(1915)；英美合办的北京汇文大学(1885年设中学及高等学校，名“怀里书院”，1888年改名为“北京汇文书院”，1893年改名为北京汇文大学，1919年由几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毛利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而登州文会馆于1864年建立“蒙养学堂”，1882年改为大学建制，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则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饱受晕船颠簸之苦,过威海与刘公岛,船身触礁,进退俱难,午夜中船客纷纷划救生艇上岸暂候,次日凌晨经一自烟台驶出的英国炮艇将船拖至烟台。狄考文等四人安全抵达登州已是1864年(同治三年)1月中旬,正是中国北方冬季寒风凛冽的季节。^③

他们到达登州,先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当时尚未有英汉字典出版,需借助英日字典,并聘请一位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做翻译。狄考文夫妇买下了一间无人烧香、久已荒芜的观音堂,加以修缮,开办起“蒙养学堂”(郭显德则于1865年前往烟台)。最初招收了6名学生,学制为6年,相当于尔后的小学。至1866年学生增加到11人。蒙养学堂自1864年至1872年的9年中,5次更换教师(时称“教习”),共招学生85名。据《文会馆志》^④记载,学满6年者仅4人,其中用于教会者1人,肄业者22人,其余皆半途而废(即毕业4人,肄业22人,中途或“开除”或“遣归”或“私去”或“废学”或“不肯立约”者共59人),并记载了这些学生的名字。这是19世纪60年代狄考文来山东开办教会学堂的第一阶段,或可称“蒙养学堂”阶段。

1872年是狄考文在中国兴办教育的一个重要年头。“九载而后,学生之程度渐高,其品德日进,来学者日益多。狄公知六年之期太迫,不足以竟造就,毅然议添高等科。于是因时制宜,置正斋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而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斋舍略为增葺,规模稍加扩充。学堂基础于是已巩,乃定其名曰:‘文会馆’,此一八七六年即光绪二年间事也。”从《文会馆志》此段记载中可知,“九载而后”(1864—1872),狄考文毅然改变学制,添高等科,置“正斋”(高等学堂)和“备斋”(高等小学堂)两种体制的学校。同时,由于“以尔时学界太稚,别无小学、中学,足备高等学堂之选,故不得不设备斋以为储材之地”。“正斋”和“备斋”相当于后来的“中学”和“小学”。“正斋六年毕业,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历史、理化、

博物暨性理、理财、天文诸科;备斋三年毕业,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诸科。”其中“乐法”课即是狄考文夫人狄就烈于1872年编写《乐法启蒙》后开设的音乐课。1876年(光绪二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共3人,姓名为李山青、邹立文、李秉义。同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开始逐步添加大学课程内容。所以命名为“文会馆”,寓意“以文会友”之意,如《登郡文会馆典章》^⑤云:“文会学馆之所以为名者,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此乃狄考文于19世纪70年代在华兴办学校之第二阶段。

1881年1月,狄考文正式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登州文会馆宜扩建为大学,定名为“山东书院”的建议。1882年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批准了狄考文的要求,同意将文会馆扩建为大学,其中文校名暂时不变。“登州文会馆”于是成为我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狄考文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校长(时称“监督”)。狄考文在1891年撰写的《登郡文会馆典章》中说:“此馆开设,已有二十七年之久,始而人数寡少,年齿尚幼,所学诸书,犹属浅显,继而人数增加,年齿亦富,所学各理,递臻深厚,故自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设定规条,立成一文会学焉。”总结了“文会馆”在27年中(1864—1891)的成长历程,也说明广义的“文会馆”是包括“蒙养学堂”在内的“学馆”。

^③ 材料引自《文会馆志·狄考文先生传》和曲拯民《中国最早的一间大学》。后者载于2002年2月美国《亚省时报》。曲拯民的父亲曲秀状(字子元),登州府黄县北宿曲家人。1904年入“广文学堂”,1910年毕业。曾任直隶保定府陆军专科师范学堂教习、烟台晨星报馆副主笔、烟台真光女校副校长等职。曲拯民(1915—)于1949年赴香港,后去东非洲,创办一织布厂。1972年赴美国定居。1988年在美国宾州出版《烟台教育发展史话(1865—1945)》一书。

^④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总编辑者王元德、刘玉峰,“中华民国”二年(1913)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摆印。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文会馆志》。

^⑤ 《登郡文会馆典章》,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1891)上海美华书馆摆印。

它经历了由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发展过程，成为我国近代早期新式学堂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⑥。文会馆的学校建设规模最初于1867年(同治六年)曾在“观音堂”的东西两侧购地略加扩充。1886年(光绪十二年)则重新择地(在原监察院后面)“建西式楼一座。一切讲堂课室、物理仪器、动植标本，悉列其中。惟藏书室、阅报所、电机房、沐浴室、化学实验处及观星台另建于重楼之后。同时亦改建斋室十数间，并旧存者足容百余人。此外，尚有西洋教员住宅一所，建于学堂东北院。博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19世纪80年代的文会馆已经是一所各种设施和设备较为齐全的正规大学的规格。

1904年，登州文会馆“正斋”迁至山东潍坊，与1884年英国浸礼会(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合并，成立“广文学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备斋”留蓬莱原地，改名为“文会中学”。1917年，广文学堂改名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址迁往济南，学校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登州文会馆自1876年第1届毕业生至1904年第25届毕业生(其中1877、1878、1883三年空缺)，共有毕业生170名，肄业者200人，而“广文学堂首四班毕业生无一非文会馆所养成者”。因此，狄考文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为我国培育了大批高等知识人才。恰如《文会馆志》云：“当庚子之难，国家受绝大创痛，乃遍设学堂，谆谆以培人才为急务，而教授科学都人士无其选，则东明(狄考文中文名，人尊称“东明先生”——引者注)高足脱颖而出，咸应聘于各等高级以分司教铎执牛耳焉”。至20世纪初我国新式学堂普遍建立之时，文会馆培养的人才纷纷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教育界各地高校骨干力量的重要来源。如1879年至1904年，“文会馆”的历届毕业生曾历任上海圣约翰书院、北京长老会学堂、北京大学堂、北京汇文书院、北京

崇实书院、南京汇文书院、京师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上海清心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浙江高等学堂、上海格致书院、南京汇文女书院、山东高等学堂、山西大学堂、济南高等学堂、上海英浸会大学堂、南京益智书院等名牌高等学堂的“教习”或“总教习”，精英人才，遍布南北。同时，“文会馆”还培育了一批具有家学渊源的饱学之士，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的外祖父王以成就是“文会馆”1899年的毕业生等等。我们很难想象从山东半岛一个偏僻城市中一所破败的“观音堂”中能够走出如此一大批中国近代高级知识分子的记录，他们遍布全国有名的大学。这样的状况和我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成立时，清政府拨款白银xx万两，但新旧势力互相对峙，满汉官员勾心斗角，朝廷上下谣言纷起的混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京师大学堂”成立时狄考文曾派出于志圣等6名毕业生前往任汉学教习，西学教习则由北京汇文书院派出)，使我们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的历史作用有了一种新的认知。以往将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布道视作“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而得出的结论。我们不排除种种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对立与差异的复杂因素，但这种结论的根本性质在于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观念和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对中国进行的渗透，但其正、负面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认识与评价。然而，从“登州文会馆”存在四十年(1864—1904)的历史事实中，作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对于我国近代教育所做出的贡献而言，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作用。它造就一批既学习“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又重视西方宗教、历史、哲学、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质、外

^⑥ “文会馆”的正式命名是在1876年。但广义的“文会馆”一般指狄考文自1864年来登州后开办的“蒙养学堂”直至1904年并入“广文学堂”为止的这一阶段(1864—1904)。

文等学科的新型知识人才,在中国社会性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传播了西方文明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同时,也为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开辟出新的时代思想潮流,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二、近代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 拓荒者——狄考文夫妇^⑦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狄考文宣读了《基督教会与教育关系》一文,他说:“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⑧这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语无疑是基督教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的一次重要宣言。这是狄考文在来华13年之后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与认识,并且预言了中国接受西方文明将成为一股新的时代潮流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趋向。更为重要的是,狄考文的言论有着可贵的实践意义,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近代科学与教育人才的培养。1863年,狄考文启程来华前即宣称:“我决心将生命献给中国,住在那里,死在那里。”^⑨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狄考文是以传教士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作为传教士,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文会馆志》称他“事神以诚,爱人以德”。他一生的座右铭是“信仰,爱心,使命,工作不辍”^⑩。狄考文夫妇到登州后,闲暇时在城里挨户叩门传道,学校休假时则带着中国助理到乡下讲道,并用科学证明来破除迷信。每到一地,“看洋鬼子啊”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对恶言相加、言语粗暴的人从不介意,也不请求官府保护。毋庸讳言,他办学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宣传宗教信仰。他认为“一人之能力几何? 诺大之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

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不若招集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结之以恩义及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蓰”。这样一种“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的宗教文化传播理论,体现了狄考文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和推行科学与教育的一种创见。同时,狄考文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他亲自撰稿的《登那文会馆典章》中即规定:“凡馆中学生,每逢圣日,须同至讲堂听讲,并读圣经,即未入教者,亦不妨入馆,其入馆后,更不强令人入教。缘耶稣教,并无相强之理也。”在文会馆开设的56门课程中,宗教性的神学课程只有《天道溯源》、《天路历程》、《圣经指略》、《救世之妙》等6门,其比重远不及国学和西方科学基础理论课程。因此,“狄考文的学生很少人从政,大半在默默中耕耘,守住自身的岗位,终生从事教育、宗教、社会或乡村工作”。狄考文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在培养中国近代早期的高级知识人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已如前述,他提出“保留最好的儒家思想加上最新的西方知识”的办学理念具有超时代意义的远见卓识,在提倡与引进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同时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文会馆开设的《读诗经》、《读书经》、《讲学庸》、《读礼记》、《讲论语》、《讲读左传》、《读作韵诗》、《作诗赋文》、《廿一史约编》等国学课程和《数学》、《地理志略》、《万国通鉴》、《测绘学》、《心灵学》、《是非学》、《航海法》、《动植物学》、《天文揭要》、《微积学》、《化学辨质》、《物理测算》等西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的结合中,我们可以认识狄考文教育思想所达到的时代

^⑦ 狄考文原配夫人为狄就烈,即《乐法启蒙》的撰写者。狄就烈于1898年在中国去世后,狄考文娶继室狄文氏,在“文会馆”中任西洋教习。

^⑧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7页。

^⑨ 同注^③。

^⑩ 同注^③。

高度。这样的一种“中西合璧”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使我们对于西方传教士在我国开辟早期教育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有了一种刮目相看的认识。狄考文用中文撰写的著作有《官话类编》、《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几何)备旨》、《振兴实学》、《要理问答》、《分子略解》、《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分习题》等12种,再加上英文书籍共20余册。有人认为,狄考文“在教育 and 著作的成就上远超过一般来华的传教士。明末,史上有名,一生著书十九本的利玛窦,与记录二十二本的汤若望,二十四本的南怀仁等都难与他相比”^⑩。此说当是不同时期的传教士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做出不同贡献的一种认识。但将狄考文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德意志人)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比利时人)相提并论,对于狄考文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接受的结论。西方宗教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西方科学、教育、艺术的发展曾经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利玛窦、南怀仁和汤若望,他们是明清时期传播西方文化的传教士,主要影响于中国宫廷的社会上层人士。狄考文来华传播宗教和兴办学堂,则是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夕,在民间兴办的新式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狄考文来华并非美国政府派遣,毫无政治色彩,纯属一种个人行为,但受到美国本地教会和信徒的支持。他办学的宗旨是“欲学者洞识各种要学,借以鼓舞后生,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同时,狄考文能够关心中国社会下层百姓的疾苦。1876—1877年,山东遭遇旱灾,狄考文和郭显德筹款赈灾,美国各地长老会捐助一万多美元。1889—1890年,黄河和小清河决口,他们二人再次发动捐款,并亲自到灾区散发赈粮和物资。狄考文在中国四十余年中,一共回美国4次,每次都是为募捐之事,还为学校的设备洽购器材,供应实验室

和工作房需要的仪器及机器。因此,文会馆的试验室与工作房有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各类电池、螺丝机、工作母机、电镀设备、烧焊用器材、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和大批化验室用品,其设备之齐全为当时全国之冠。在大学成立后,这些设备还向平民开放,仅1887年参观的人数就有12000人之多。此外,文会馆的药房里可做消毒、止血、局部麻醉、拔牙、疮疖开刀、包扎、上绷带和上石膏等治疗,并备有大宗药品向百姓免费赠送,对于每年秋季流行死亡率最高的虎烈拉(霍乱)起到了一定遏止作用。狄考文认为,“科学知识使人类增进健康,它足以造福人类,医学尤属重要”。他在传教、办学的同时,在中国文化滞后、百姓愚昧无知的乡村,又传播了西方的科学和医学知识。1895年,狄考文主动辞去文会馆校长职务,由赫士(Watsonm Hayes D.D.)继任,他则专心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一直担任翻译圣经委员会主席。1908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秋天在烟台召开委员会会议期间患阿米巴痢疾,送至青岛由德国人开办的医院治疗,因抢救未果逝世,享年73岁。同年10月4日葬于烟台玉皇顶(现烟台毓璜顶公园北坡美国公墓墓地)。狄考文一生未有子嗣,也没有任何私产,他唯一遗留下来的财富就是中国最早的这一所教会大学——“文会馆”,以及他所培养的许多中国学生。

1872年,狄考文将“乐法”课列入文会馆第二年开设的课程之中,这是我国近代早期教会学堂开设的音乐课之一^⑪。同年,他的夫人狄就烈编写的《乐法启蒙》出版。狄就烈是一位极有文化教养的女性。她随同狄考文来中国传教,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无怨无悔,对

⑩ 同注③。

⑪ 我国近代早期开设音乐课的教会学堂有:香港“马礼逊学堂”,这是现知中国人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堂(1842年);西方传教士最早在华开办的学校“崇信义塾”(宁波)则于1845年开设音乐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W. Fambham)创办的“上海清心书院女校”于1861年开设,其后即为“登州文会馆”于1872年开设音乐课。

待学生情同母子。1888年文会馆毕业的朱葆琛称赞狄就烈“遇学生遘疾，则亲视汤药，候起居、调饮食，节寒暖往来蹀躞孜孜焉……同学数百人皆畏之如严师，爱之如慈母也”。“今中国论道学者必于东明先生首屈一指。门下宣教旨者有人，司教育者有人，精医术者有人，操工艺者有人，非夫人匡弼辅佐之功不至此。”^⑬协助狄考文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启蒙性贡献。《乐法启蒙》于1879年以《圣诗谱》(内附《乐法启蒙》)为书名印行补编，1892年、1907年、1913年曾多次补编重印。全书按问答式的体例编写，共设十八个段落，由“总论”、“高低”、“长短”、“杂号”、“相协”、“式样”、“清浊”、“结语”等标题概括。涉及基本乐理中的音阶、节奏、节拍、音程、记谱法、调式调性、转调、音乐术语、歌唱方法、演唱处理诸问题。全书语言通俗易懂，十分口语化，其宗旨主要用于“教导学生同教友们唱诗”。《圣诗谱》内刊圣咏歌曲369首(书中称为“调”)，讽诵歌17首，全部为五线谱印行，且多为二声、四声部歌曲。此外还有杂曲小调25首，其中第22首《六八》为五线谱与工尺谱对照形式抄录，起到类似视唱练习的作用，成为在全国基督教会具有广泛影响的赞美诗集。在由《乐法启蒙》改名为《圣诗谱》出版的英文序言中说：“本书虽然用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出版，但实际上它是《乐法启蒙》一书修订后的再版。1872年印行初版，1879年印行补编。尽管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但很快销售一空。很多人还需要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部分，这成为本书新版诞生的契机。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学习四声部的歌曲，所以就有必要加入男高音和女低音的声部；同时，由于有越来越多的新赞美诗可供选择，也就要求有大量不同的旋律与之相配。以上内容不仅增加了本书的内容，也同时增加了本书的成本。纵观各地和不同教堂所使用的赞美诗集，才有了这个想法，就是：编一部仅有旋律和用于熟悉旋律的一段歌词的赞美诗集，要比任何一部专门旋律加歌词的诗集都具有

更广泛的意义。”^⑭因此，《乐法启蒙》是目前所见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的著作。《圣诗谱》中的歌曲则已经融入相当部分的中国曲调，认为“用于熟悉旋律”(即中国曲调)的赞美诗集，要比任何一本“专门旋律”(即西方曲调)的赞美诗集都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这在近代早期西方音乐(赞美诗)传入中国的阶段，就提出并与运用同中国曲调相结合，无疑具有一种重要的创意性价值。《乐法启蒙》的问世，开创了我国近代出版音乐教科书之先河。狄考文夫妇二人，在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中起到了拓荒者的作用。

三、我国近代早期“乐歌” ——“文会馆唱歌选抄”

《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保存了我国近代早期的10首“乐歌”，这些歌曲的曲名及作者依次为：《乐赴天城》(刘玉峰)、《赏花》(周书训)、《夏日》(冯志谦)、《快乐词》(孙象乾)、《逍遥曲》(綦鸾翔)、《恢复志》(冯志谦)、《仁寿》(王元德)、《得胜歌》(连志舵)、《快活之日》(王元德)、《爱国歌》(刘玉峰)。其中，除《爱国歌》是《文会馆志》总编辑之一刘玉峰在编辑《文会馆志》时补入歌颂“民国”成立(1912)的作品外，其余9首歌曲之下限均为1904年“文会馆”并入“广文学堂”之前编创的“乐歌”。在这些歌曲前面有一段相当于“编者按”的话：“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咏者，排印于左。苟吾辈同学邂逅相遇，按谱歌之，不特当年情况宛在目前？即此文会馆志亦活动生趣矣。 苕陵王元

^⑬ 《文会馆志》：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

^⑭ 上述原文均引自1907年版增补重印《圣诗谱》，上海美华书馆铸印。其中英文序言(摘要)由德国路德维希堡教育大学文化管理学院(Institut fuer Kulturmanagement der Paedagogische Hochschule Ludwigsburg)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管理博士孙海于2004年5月翻译。原件由孙继南保存。

德志。”王元德于1904年在“文会馆”毕业后曾助狄考文翻译圣经,后任“广文学堂”教习。他和刘玉峰二人担任了《文会馆志》的总编辑。这段话要点有三:(1)这些歌曲是“文会馆”历年来积累的作品;(2)用于集会、讲演会、毕业典礼等场合的集体歌唱;(3)“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原有数百篇之多。这样的情形使我们对19世纪下半叶教会学堂的音乐活动确实需要重新认识了。同时,这些歌曲作品之上限可以早到1880年左右。因为文会馆在“备斋”第二年次季即开设“乐法启蒙”课,不仅教导学生歌唱、识谱,还要编写歌曲,并收集中国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学生在校期间(“正斋”、“备斋”)为9年,从第二年算起直至毕业,则有8年的上下限幅度。因此,9首歌曲中,《赏花》无疑是最早的一首“乐歌”,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快乐词》和《逍遥曲》为两位教习所作,在1913年《文会馆志》出版

时均“已故”,年代也有可能偏早。其余多为19世纪90年代的歌曲,少量则属于20世纪初期的作品,如王元德之《仁寿》是为庆贺文会馆成立40周年而编创的歌曲,可以确定为1904年之作品。这样一种早期“乐歌”的编创现象,无疑起到了历史补白的作用。

“文会馆歌曲”按题材分类,大致可分为爱国歌曲(如《恢复志》、《得胜歌》、《爱国歌》)、抒情歌曲(如《赏花》、《夏日》、《快乐词》、《逍遥曲》)、宗教赞颂歌曲(如《乐赴天城》、《快乐之日》),以及具有进行曲风格的颂歌《仁寿》四类。对这些多声部歌曲的旋律、和声与曲体结构的粗略分析中,我们大体能够了解19世纪末叶在教会学堂中学生编创“乐歌”所反映的时代风貌、精神气质,以及学习西方歌曲创作手法的一些特点。现列举两首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做简要介绍:

(一)《赏花》

赏花 (周书训作)



雪 消 冻 解 东 风 报 到 花 开 园 丁 扫 径 等 那 赏 花 人

来 排 闼 入 逍 遥 迈 唤 来 美 酒 乐 举 杯 锦 绣

场 中 共 徘 徊 牡 丹 开 富 贵 芍 药 红 一 色 蜂 蝶



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编创年代最早的一首乐歌。作者周书训，字铭九，山东青州府安邱县逢王庄人。1988年于登州文会馆毕业后留任教习，后曾任山东潍县文华书院教习、浙江台州知新学社教习，至“民国”成立时任青岛礼贤书院副校长，同时任长老会青岛支会长老。这首歌曲内容描绘冬去春来，百花盛开，赏花人在芍药、牡丹丛中徘徊，只闻见蜂蝶飞舞，柳枝飘拂，管弦声声，于是作者面对美好春光倾诉衷怀。四句歌词为长短句形式，富有古典诗词韵味，语言清新流畅，继承了我国传统文人歌咏自然、饮酒舒怀的写作特色。曲调应取自圣咏歌曲。全曲共16小节(8+2+6)。第一乐句后有两小节的短小插句，第二乐句则是第一乐句的压缩再现。歌曲为四声部合唱。和声以正三和弦为主。第一乐句优美舒展，插句中低声部运用了填充节奏与高声部的长音形成对比，在全曲中有着起伏变化的效果，再现句的压缩变化具有紧凑、跳跃的特色。整首歌曲结构完整，前后呼应，其中插句与再现乐句的“填充节奏”，安排恰到好处。词曲结合基本吻合，节奏密集乐句的歌词稍嫌拗口，旋律伸展音处的歌词则较为自然。《赏花》的单旋律歌谱后来收入杜庭修于1932年编印出版《仁声歌集》和邓余鸿于1942年编印出版《101中文名歌集》之中，在三四十年代依然有着广泛影响。《赏花》的产生年代与学堂乐

歌代表人物李叔同(1880—1942)、曾志忞(1879—1929)的出生年代大致相当。在19世纪下半叶，我国早期“乐歌”能够有这样的作品产生，应当说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二)《恢复志》

《恢复志》是一首结构庞大的爱国合唱歌曲。作者冯志谦是文会馆1898年毕业生，字益斋。山东青州府临朐县龟山庄人。毕业后曾先后任上海嘉定清华书院教习、天津坤范女学堂教习、山东高等学堂教习。在《文会馆志》编印出版时(1913)已逝世。歌曲为领唱、重唱与合唱形式。歌词多为七字句格式，全曲共有52句之多。内容歌颂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锦绣河山和丰富宝藏，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祖国的侵略行径表示了强烈谴责，反映了盼望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收复失地的迫切愿望。从歌词中“光复青岛威海卫，奉还旅顺大连湾”分析，歌曲应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逼迫清政府签订《刘公岛条约》，开进威海卫港和1897年11月德国强占青岛，同年12月俄国占领大连湾，1898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占旅顺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因此，《恢复志》应是冯志谦于1898年毕业前编创的“乐歌”作品。

这首歌曲曲调宏伟壮丽，全曲由五个段落和一个尾声组成，为变化调性和织体的分

节歌形式。调性布局为**B—F— \flat B—F— \flat B— \flat B**；织体为独唱——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四部合唱——四部合唱。每个段落的曲式均为均匀对称(8+8)的二部曲式。和

声以正三和弦为主,偶尔运用到属七和弦。第一段落的曲调(独唱)为整首歌曲主题,具有雄伟庄重的进行曲风格。

(独唱)

天 创 中 华 几 千 年 教 化 礼 仪 独 占 先 华 丽 盖 通
都 巨 镇 锦 绣 铺 名 山 大 川 四 万 万 天 资 灵 明
十 八 省 宝 藏 与 焉 两 半 球 上 称 胜 地 英 法 俄 德 皆 垂 涎

此后,同一主题在歌曲的展开中不断变化调性、织体,越来越加重多声部的厚度,逐渐形成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昂的气氛和效果。如第二段为“二重唱”形式,低声部与高声

部演唱的主旋律形成复调对比的穿插效果。此后每一次织体的变化均以不同手法与音乐主题构成或烘托或呼应的效果,以至于每一段落的变化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手法。

(二重唱)

何 志 士 更 张 太 急 数 年 前 陷 地 蹶 天 波 浪 滚 滚
何 志 士 更 张 太 急 数 年 前 陷 地 蹶 天 杀 人 波 浪 滚 滚 奎
鸾 仪 殿 祸 水 滔 滔 颐 和 园 蚕 食 鲸 吞 欲 逐 逐
鸾 仪 殿 祸 水 滔 滔 颐 和 园 到 此 可 怜
瓜 分 豆 剖 意 绵 绵 可 恨 那 英 雄 豪 杰 如 懒 云 不 肯 出 山
可 恨 那 英 雄 豪 杰 如 懒 云 不 肯 出 山

歌曲第五段落经由三重唱、四重唱之后发展为四部合唱,女高音声部演唱主旋律,其余三个声部以八分音符节奏的连续进行作为衬托,唱出了“拓土开疆追元业,对欧冠亚旧中原,光复青岛威海湾,奉还旅顺大连湾。远臣安南古印度,东海琉球与台湾,南面而立朝列国,端拱垂上都北燕”(歌词中存在的不妥处乃是反映了百年前青年学生的爱国历史观)。将收复失地恢复疆域的迫切愿望推向了整首歌曲高潮。“尾声”(自歌词“牛放桃林马

归山”开始)则是一个新的曲调,开始具有较为浓郁的抒情气息,后部则以雄壮的进军号音调结束。这也是目前所见进军号音调在我国近代音乐作品中的首次运用。这首歌曲实际上已经加进了许多“创作”成分。这样的多声部“乐歌”作品产生在19世纪末叶,特别是在教会学堂中出现的反映青年学生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与精神风貌的歌曲作品,对于展示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面貌,确实起到了“史无前例”的作用。

燕拱都北燕 牛放桃林马归山

前面而立朝列国 端拱垂裳都北燕牛放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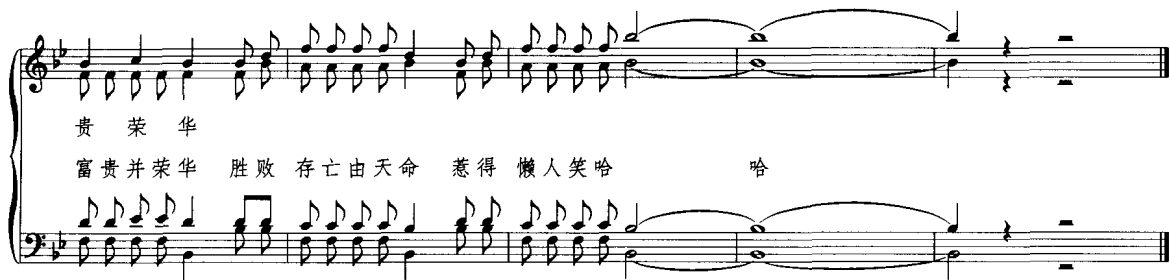
墨舞笔歌天下安 说什么亚立山大 说什

林马归华山

么维多利亚 否泰循还有定理 异日欧洲今罗马 说什

么威武权势 说什么富

么威武权势 说什么威武并权势 说什么富贵荣华 说什么



《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歌曲曲调，大多根据赞美诗曲调或欧美歌曲填词。钱仁康先生认为：“第一首《乐赴天城》的原曲是Stephan Foster(1826—1964)的《Old Folks at Home》。第五首《逍遥曲》的原曲是Knowles Shaw(1834—1878)作词、George A. Miner作曲的《Bringing in the Sheaves》。第八首《得胜歌》的原曲是Franz Abt(1819—1885)作曲的一首歌曲，吴梦非夫人王元振女士(1890—1972)曾根据此歌填写《杜宇》的歌词(见钱君匋编《中国名歌选》[1928])。第十首《爱国歌》的原曲是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King’。此歌歌词有‘王族共和一家’、‘求主佑我总统’等句，想系辛亥革命后改作。其他六首须查各种赞美诗歌集才能查明原曲。十首歌曲写得最好的是第六首《恢复志》。”^⑤因此，“文会馆歌曲”以保存了百年之久的音乐文本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我国早期“学堂”中“乐歌”的历史原貌。

“文会馆歌曲”之价值在于将我国学堂乐歌的历史渊源提前到了19世纪70年代教会学堂“登州文会馆”开设“乐法启蒙”课(1872)之后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较之于沈心工1902年在日本编创的《体操一兵操》早了三十年的时间。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对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到我国开办教会学堂、传播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作用产生了新的认知。尤其是“文会馆歌曲”中爱国题材歌曲的出现，与以往对西方宗教文化在我国传播的正负面影响之认识，起到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历史辩证意义的反思作用。正如冯文慈先

生所强调的：“西方教会学校的教育和中国传统旧式教育不同，其特点除了进行宗教教育、近代科学知识教育以外，音乐课程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或必修，或选修，包括歌咏、西方乐器演奏、组织军乐队、管弦乐队、传授西方乐理知识，有的还有唱诗班，等等。教会学校的建立，为西方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基地。”^⑥《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和《小诗谱》^⑦等教会学堂的赞美诗曲谱和乐理著作出版，以往只是停留在文化交流理论层面上的一种认识，而“文会馆歌曲”发现后，使我们了解到它对近代早期“学堂乐歌”的编创实践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爱国多声部歌曲的出现和五线谱使用的历史，有了一个全方位重新认识的意义。诚然，“文会馆歌曲”多数还只是在当时山东半岛一个偏僻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流传，其非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尚未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辛亥(石更)、夏颂莱等一批“乐歌”作者群体的出现和《中国男儿》、《体操一兵操》、《祖国歌》、《何日》(下转第97页)

^⑤ 引自钱仁康2004年11月25日致孙继南信。原件由孙继南保存。

^⑥ 冯文慈著《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55页。

^⑦ 《小诗谱》(Tune—Book in Chinese Notation)英国基督教新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夫人(Mrs. Timothy Richard)著，1883年太原初版本刻刊本，1901年上海广学会增补石印本。全书有121首曲调，内有60余首赞美诗曲调，6首赞美诗歌曲，还有《老六板》、《步步高》和佛教寺庙歌调等中国曲调，该书兼用于视唱教学。

授,并结合中国传统音乐鉴赏来实证地考察存在的中国音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整合中,音乐的理论技巧做到了更为有效的衔接,学生更容易做到融会贯通,而且其必修课总量压缩,还解决了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所困扰的必修课程过重的难题,可谓是一举多得。

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给予足够的重视是赵沅晚年提得最多的话题,这一点在《草案》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举李政道博士提出的“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例,说明“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社会科学情怀,二者缺一不可”。他为音乐专业教育改革所列的四点根据,“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必须具备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情怀”位列第一。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体系中,很多属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如音乐人类学、音乐考古学等,但他认为只要是对学生成才确实有利,就可以大胆开设。

赵沅在有关高师音乐教育问题上,还有许多重要思想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研究。如他十分重视我国传统乐教思想,重视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继承和研究;他主张学术是学校

办学的根本,提倡充分地尊重、信任教师;主张实行宽进严出的入学和修毕制度,提倡实行全面的学分制;主张改革要敢于打破常规,等等。实际上,赵沅在推行其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的,但他没有退缩,直言疾书,从不计个人得失。所有这些,无不显现着他教育思想的大局观和超前意识,同时也无不饱含着一个老艺术家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遗憾的是,赵沅没有等到他绘就的蓝图全面付诸实施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对于高师音乐教育改革,赵沅既有超前的教育理念,又有客观的形势分析,同时还有具体的方法、措施,它们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幼儿音乐教育思想等一起共同构成了他整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系,这是赵沅在人生最后阶段奉献给世人的精彩乐章。他的高师音乐教育思想,对于今天蓬勃开展的以课程为核心的高师音乐教育改革,无疑既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又将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上接第49页)《醒》等通俗易唱、广泛传播的作品问世,注定了它只是在教会学堂比较狭小的范围中传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的命运。然而,在使用五线谱记写多声部歌曲,运用和声、复调、织体变化等技术层面上,它又遥遥领先于20世纪前期学堂乐歌的蓬勃发展时期。这样一种“曲高和寡”的文化现象,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研究。总之,中国近代“学堂乐歌”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无疑由于这一史料的发现而有了重新梳理之必要。19世纪后半叶在教会“学堂”中产生的“乐歌”,犹如星星之火,逐渐在社会上蔓延为燎原之势。近代最早编创“乐歌”的群体是在中国土

地上土生土长同时又接受西方文明教育的青年学子。任何时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总是由音乐创作率先体现出相异于“古歌旧曲”而具有新时代内容与形式重要特征的作品。在这一层面上,“文会馆歌曲”具有标志中国近代音乐历史开端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的全部资料,均为孙继南先生提供多年搜集、积累与珍藏之史料。对于先生这样一种无私的学术精神,在此表示感谢和敬意。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

作者: [刘再生](#), [Liu Zaisheng](#)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音乐学院](#)
刊名: [音乐研究](#) PKU|CSSCI
英文刊名: [MUSIC RESEARCH](#)
年, 卷(期): [2006](#), (3)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17条)

1. [孙继南](#) [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期刊论文]-[音乐研究](#) 2006(02)
2. [同注](#)
3. [孙继南](#) [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 2004
4. [狄考文](#)原配夫人为狄就烈,即《乐法启蒙》的撰写者。狄就烈于1898年在中国去世后,狄考文娶继室狄文氏,在“文会馆”中任西洋教习
5. “文会馆”的正式命名是在1876年。但广义的“文会馆”一般指狄考文自1864年来登州后开办的“蒙养学堂”直至1904年并入“广文学堂”为止的这一阶段(1864-1904)
6. [登郡文会馆典章](#) 1891
7. [王元德](#); [刘玉峰](#)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 1913
8. [查看详情](#) 2002
9. 自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大学有:美国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90年设立大学部,1906年正式成立大学);沪江大学(1908年创办浸礼大学,1915年改名沪江大学);武昌的文华大学(1903年设立高等科,1909年为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1901年由苏州博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合并,1905年招大学生);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年筹建);广州的岭南大学(1888年在广州设格致书院,1900年迁澳门,改名岭南学堂,1904年迁回广州,1918年改称岭南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1888年创办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改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13年筹办);杭州的之江大学(1910);福建的协和大学(1915);英美合办的北京汇文大
10. [《小诗谱》\(Tune-Book in Chinese Notation\)](#)英国基督教新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夫人(Mrs. Timothy Richand)著,1883年太原初版木刻刊本,1901年上海广学会增补石印本。全书有121首曲调,内有60余首赞美诗曲调,6首赞美诗歌曲,还有《老六板》、《步步高》和佛教寺庙歌调等中国曲调,该书兼用于视唱教学
11. [冯文慈](#) [中外音乐交流史](#) 1998
12. [钱仁康](#)2004年11月25日致孙继南信。原件由孙继南保存
13. [圣诗谱](#) 1907
14. [朱葆琛](#) [狄夫人邦就烈事略](#)
15. [我国近代早期开设音乐课的教会学堂有:香港“马礼逊学堂”,这是现知中国人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堂\(1842年\);西方传教士最早在华开办的学校“崇信义塾”\(宁波\)则于1845年开设音乐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mbham\)创办的“上海清心书院女校”于1861年开设,其后即为“登州文会馆”于1872年开设音乐课](#)
16. [同注](#)
17. [同注](#)

引证文献(2条)

1. [宫宏宇](#) [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向\(上\)](#) [期刊论文]-[音乐研究](#) 2008(3)
2. [宫宏宇](#) [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 [期刊论文]-[音乐研究](#) 2007(1)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inyj200603005.aspx

授权使用: 山东大学(sdx), 授权号: afab245b-eecc-4df3-b2cf-9ef400a574d0

下载时间: 2011年5月31日